

编者按: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宝鸡作为后方,不仅有工合学校、日俘学校,还迎来了不少流亡学校,如东北竞存中学、河南大学、开封高中等,西府村庄里传出了流亡学生的琅琅读书声。同时,一批有学识、有情怀的教育家也随之来到宝鸡,他们在西府开荒建屋、教书育人,传递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在抗战岁月里,来到宝鸡的教育家以情怀和双手,培育出了一批批学子,并在宝鸡地区留下了动人的教育佳话。

抗战时期来宝的教育家



车向忱：带领竞存师生迁往凤翔

本报记者 张琼



在凤翔县竞存中学校史馆里,塑有教育家车向忱的塑像,至今,每一位进入竞存中学的师生都会去校史馆聆听他的故事。抗战时期,为保护东北流亡儿童的生命安全,车向忱带领东北竞存学校师生迁往凤翔县纸坊村,在当地艰苦办学,培育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才。

1935年夏,教育家车向忱来到西安,开展东北流亡儿童教育工作,他在西安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学生免费入学读书。随后,在中共党组织支持下,学校学生数量从最初30人发展到700多人。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西安,车向忱带领竞存学校师生搬迁到凤翔县纸坊村。刚到纸坊村办学,条件很艰苦,师生住在两座破庙里教学、学习,“居住在破庙,饮食在露天,大树下讲课,小河水饮水”,讲的正是竞存学校办学的环境。1939年3

月,车向忱为竞存学校题写校训——“创造、团结、耐苦、奋斗”,带领全校师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有粮食就开荒种地。当时缺乏学习用纸,音乐家教师张寒晖带领师生造纸,在吸收纸坊村人造纸技术上,研制出以麦草为原料的黄色宽幅纸,命名为“寒晖纸”。

当时,为解决校舍问题,车向忱带领师生自己动手盖房子,拉石头、和泥巴、锯木头,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不久,25间新瓦房盖好了,车向忱挥笔写下“众志成城”三个字。竞存师生勤奋吃苦、积极好学的言行,打

动了纸坊村村民,村民们提供荒地、闲置屋舍、造纸设备等,支援学校建设。当时,车向忱得知当地许多儿童也希望得到就学机会,便招收插班生,一律免费入学,1939年春就有30多名孩子在竞存学校读书。

“园内蔬菜,全由同学课外亲自培植,供全校食用。走进校门,见满院鸡鸭呱呱乱跑,很有农家的风味。再往前走几步,越过一处墙角,见师生200余人,男女均着粗布衣,同聚院子里棚下,正吃午饭,很像一个大家庭……”这是1939年《抗战》记者报道中的竞存中学。

在纸坊村办学期间,车向忱、张寒晖等人还带领师生利用唱歌、演讲、话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张寒晖创作了一些抗日歌曲,并召集村上儿童,教孩子们唱《骂汪精卫》《三劝》等抗日儿歌,这些歌曲在周边农村流传较广。1962年,车向忱来到凤翔东北竞存学校旧址走走看看,对这块土地饱含深情。如今,在竞存小学校园里,有一棵被师生特殊保护的龙爪槐,它是车向忱校长当年亲手栽下的。斯人已去,但他留在西府的教育故事仍被人们铭记。

汪大捷：大同学园里教化日本战俘

本报记者 于虹

在渭滨区高家镇太寅村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块《大同学园碑记》石碑,记载了8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1938年,日军飞机开始对西安、宝鸡、汉中等地进行轰炸,国民政府只能将设于西安终南山下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迁往宝鸡。恰在此时,日俘伊藤正荣逃跑被抓回,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

上校参议汪大捷,以教化的方式感动了伊藤正荣,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汪大捷随即奉命出任所长,负责将收容所迁往宝鸡太寅村。

刚开始这些日俘不好管理,经常和工作人员起冲突,时常有人逃跑。汪大捷担任所长后,他采用教育的手段来管理,并根据中国传统儒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思想把战俘收容所改名为“大同学园”,情况才有所好转。为

了丰富战俘的文化生活,收容所专门为战俘开辟了篮球场,组织他们参加运动和比赛。除了夏季组织到渭河游泳外,还利用河水在驻地修了一个简单的游泳池。战俘们修建了一条从大同学园到宝鸡县城约十公里的简易公路,参加修路的人每日可以得到两角零用钱,该路在解放前也被命名为“大同路”。

收容所还组织这些学员学唱反战歌曲,编演剧目。

1939年7月7日,独幕剧《觉醒吧,同志》和现代剧《侵略战争的罪恶》在西安上演,当时在钟楼北边的明星剧院公演了三天,天天爆满。同时,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这些战俘还制作了躺椅、筷子、手杖、玩具、肥皂盒之类的物品,学员们编织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等很受村民的喜爱。由于产品受欢迎,战俘收容所在宝鸡县城西街租用了一间房子,专门销售学员制作的物品,所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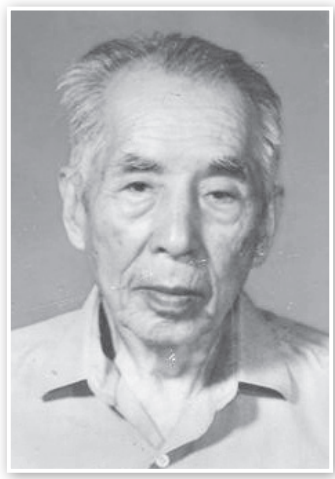
之钱全数兑现给物品制作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同学园内近500名战俘坐火车遣返回国。

全国解放时,汪大捷毅然留在大陆,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1972年中日建交后,汪大捷赴日讲学,并受聘主编《日英汉科学技术大辞典》。后来,汪大捷客居日本,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吴惠民：率郑州流亡师生来西府

本报记者 张琼



在郑州市第五中学(下文简称“郑五中”)有一栋楼,名叫惠民楼,是为纪念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中学(郑五中前身)校长、教育家吴惠民。抗战时期,吴惠民带领全校师生800余人徒步西迁,几经辗转落脚凤翔县王堡村办学,在村里学习生活两年多,在宝鸡留下了教育佳话。

吴惠民是河北临漳人,曾就读于北京国立农科大学以及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北伐战争。吴惠民热爱教育事业,1942年担任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

中学校长,学校的孩子是从几个难民所集中起来的流亡儿童。时间拨转到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强渡黄河,4月18日早上,校长吴惠民当机立断,带领全校师生向陕撤离。《新华日报》曾报道当时的情景:“吴氏带领全体师生星夜逃出。学生中有年仅六七岁的幼童,最大者不过十六七岁,沿途遭敌人追击,几度冲过敌人包围,历经艰险……”

根据流亡学生回忆录显示,逃亡路上凶险无比,路边炸死的人、马等更让孩子们胆战心惊,校长和老师成为孩子们

的依靠和希望。在郑州登封东五司一带,流亡队伍遭到数架敌军飞机低飞轰炸,孩子们趴在麦地里不敢抬头。吴惠民猜测,队伍可能误入了双方的战斗阵地,吴惠民随即朝孩子们大喊,快向前跑,在老师连拉带抱的引领下,孩子们才脱离了危险地带。1944年6月到达西安后,又辗转来到凤翔县城,吴惠民细心考察,全校师生选择落脚王堡村,至此结束逃亡之路。

在吴惠民带领下,流亡学校在王堡村扎下根来,校本部设在村里张家大院,并于1944

年7月17日正式复课。此后2年多时间里,吴惠民带领孩子们克服种种困难,没有桌椅就用破条板代替,没有床就打地铺,年幼学生缺乏照料就采用结姊妹的办法,大孩子照顾小孩子……王堡村里,传出了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孩子们坚持学习、团结互助,没有一名学子放弃学业。当然,这离不开王堡村人的帮助。张家后人张万辉曾向记者介绍,当时张家大院有院子七八个,屋舍200多间,解决了大部分师生的住宿问题,其余学生住在庆照寺或乡亲们的家里,近2年时间

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5年8月15日晚上,有人到学校来报信,说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吴惠民和全校师生兴奋不已,大家一起为抗日战争胜利而欢呼、流泪。1946年2月4日,吴惠民带着打点好行李的师生们,再次踏上征程,王堡村乡亲们将他们送至村口。14天后,孩子们返回了郑州的校园。如今,吴惠民与郑州流亡师生的故事被刻在王堡村纪念碑上,为学校生存、为学生安全而奔波操劳的吴惠民,是王堡村人敬重的好校长。

李俊甫：向李约瑟介绍中国化学

本报记者 于虹

“卢沟桥事变”后,坐落在河南开封的河南大学开始辗转迁徙。1945年3月,日寇在豫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阳失守,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学校师生及眷属数百人步行400多公里,到宝鸡武城寺、石羊庙、姬家殿等地暂时安居,继续办学,在这批师生里,就有时任化学系主任的李俊甫教授。

早年在美国求学的李俊甫教授,1934年在河南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在全系进行

教学改革,他提出应该文理渗透,文理兼容。化学系在他的主持下,教师有章可循,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使该系很快成为河南大学理工学院教学搞得最好的系。1938年,重回母校的李俊甫,再次担任化学系主任,和河南大学共同经历了8年的流亡生活。

1945年秋,英国杰出的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访问河南大学,李俊甫教授负责接待。为了欢迎李约瑟一行的到来,河南大学在石羊庙村校址举

行了欢迎仪式。全体师生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听取了李约瑟题为《科学与民主》的演讲。作为向导,李俊甫陪同李约瑟参观了流亡宝鸡的河南大学图书馆。“我花了一个下午和李俊甫教授一起参观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散使图书受到很大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刚由汗流浹背的搬运工们从扁担上卸

下来似的。”李约瑟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载。

作为理论化学博士,李俊甫不仅在溶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对中国古代化学史也深有研究。李俊甫向李约瑟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参考文献资料。两位科学家相见恨晚彻夜长谈,来自剑桥的科学家第一次了解到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化学史。

也就是这次相遇,让他们结下了终生难忘的友谊。李

约瑟博士离华回国后,写出了那本引起世界科技界轰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书里用了很长一段文字描述了在宝鸡时,他与李俊甫的相会。李约瑟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中,李俊甫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介绍,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他们饶有兴趣,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完全不知道的。李俊甫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